

MARILYN MONROE



Marilyn Monroe

2006年法国“联盟奖”获奖小说

梦露的最后岁月

[法] 米歇尔·施奈德 著
瞿 钧 译

2006年法国“联盟奖”获奖小说



梦露的最后岁月

[法] 米歇尔·施奈德 著 瞿 钧 译

梦露的最后岁月

MICHELLE DE SCHNEIDER

[法] 米歇尔·施奈德 著

瞿 钧 译

出版人：瞿 钧
责任编辑：瞿 钧
封面设计：瞿 钧
插图设计：瞿 钧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印刷：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电话：(023) 2777777 转 810

E-mail: chongqing@chongqing.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2 字数：28.2千字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Marilyn dernières séances © Editions Grasset & Fasquelle,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07)第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露的最后岁月/[法]米歇尔·施奈德著;瞿钧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1

书名原文:Marilyn dernières séances

ISBN 978-7-5366-9283-1

I. 梦… II. ①施…②瞿… III. 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5889号

梦露的最后岁月

MENGLU DE ZUIHOU SUIYUE

[法]米歇尔·施奈德著

瞿钧译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陈建军

特约编辑:唐琳娜

装帧设计:私设坊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5 字数:282千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1955年4月的一天，玛丽莲·梦露正和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一起参加一个葬礼。

“我要去染一下头发，”玛丽莲对卡波特说，“可我总没时间。”

她一边说一边拨开头发，把发缝上的一条深色印记指给他看。

“我怎么这么幼稚。我一直以为你的头发是百分之百的金色呢。”

“我的头发就是金色的，但没有谁的头发天生就是纯金色的。哎呀，你真烦。”

就像玛丽莲深浅不一的发色一样，这部小说——或者说这些混在一起的小说——也是虚实难辨。与那些开篇就表明自己的故事“纯属虚构”的老电影不同，这部小说从真实事件中汲取了灵感，人物的姓名都是真实的，除非考虑到在世者的隐私。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也都经过核实，所引用的话也是从这些人物的传记、笔记、信札、文章、谈话、书籍和影片等当中摘出来的原话。

只有下面一些东西经过了作者的加工，比如，将这个人说的话写成是那个人说的；声称有一些话是从某人的日记中摘录的，其实并没有找到该日记。另外，还编造了一些文章或笔记，或给人物炮制了一些难以考证的心理活动等。

玛丽莲·梦露和她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原本是两个毫无干系

的人，是命运的捉弄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因此，在这场无关爱情的爱情故事里，不必去探究哪些事情是真的，而哪些又像是真的。至少，我是依照人物原型在真实生活中的性格特征来勾画两位主人公的，并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写下了这个故事。

只有想象才能通往现实。在故事的最后，或者在人生的最后，我们触及的并非总是每个人的事实。写书的这个人（其实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主人公玛丽莲和拉尔夫）——看着正在写作的这只手，好似看着一只别人的手，在写下的一字一句中追溯逝去的时光，它留在纸上的痕迹像是镜子里的倒影。这只手从左到右地写着，写着，直到黑暗的屏幕上出现“无信号”的字样。

我希望所有这些私密的话语、这些看得见的行为、这些经过反向折射而被打碎的人物形象停在一个问号上，停在书中人物渐渐模糊时，这时，作者写作的手才会停下来，像无人看管的孩子的手那样张开。

chargé de la culture—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由法国文化部—国家图书中心赞助出版

►► 洛杉矶市中心，西第一大街

2005年8月

倒片。让胶片倒回到头，让整个故事重新开始，重新回放一下梦露的最后一幕。很多东西往往得从最后开始。我很喜欢从画外音开始的电影。画面很简单：一个游泳池、一具漂浮着的人体、一棵受到震动而抖动着棕榈树、一个被床单裹着的裸体女人，以及昏暗中隐约可见的玻璃碎片。有人在说话，在跟他自己说，为了不感到孤独。一个逃跑的男人——一位私人医生——也许是一位心理分析医生——在银幕那一端讲述他的一生，所有经历过的一切全都浮现在他眼前，特别是那些让他死去活来的东西。他的声音似乎在说：“请听我讲，因为我就是你。”仿佛构成故事的是他的声音，而不是故事本身。

现在我来讲一讲这个故事，我们的故事，我的故事，也许这是个肮脏的故事，即使我们可以把故事的结尾抹掉。一个行将就木的女人，牵着一个悲伤的小女孩去看一位脑科医生，医生通过跟她对话来进行治疗。他拽住了她，接着又把她扔了出去，不知是出于爱还是卑劣。他听她不停地讲，一听就是两年半，然后他什么也听不见了，因为她消逝了。这或许是一个悲哀的、甚至险恶的故事，任何东西都无法抵消它的忧伤，就连梦露那像是在向世人致歉的迷人一笑都无法弥补。

在玛丽莲·梦露的最后一位心理医生拉尔夫·格林逊死后留下的文件中，人

们发现了这些不知何时写下的片断。1962年8月5日的凌晨4点25分，刺耳的电话铃声突然在西洛杉矶警署响起，值班警官杰克·克莱蒙斯接起电话，听到一个男人微弱的声音：“玛丽莲·梦露服药过量——已经死了。”这位吃惊的警官问：“什么？”生硬的男声又说：“玛丽莲·梦露死了。她自杀了。”

倒片。8月的洛杉矶，依然骄阳似火，污尘给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粉色的面纱，2005年的洛杉矶似乎比四十年前显得更不真切、更工业化、更裸露，也更差劲了。市中心车来人往、拥挤喧嚣，让人的眼睛倍感疲劳。《洛杉矶时报》社位于西第一大街202号，记者福杰·W.贝克莱特的办公室里，此时走进来一位高大、有点驼背的老人，他像个迷路的人那样打量着周围。

他叫约翰·麦纳，八十六岁。作为该市地方检察院法医室的副主任，他正是当年给玛丽莲·梦露做尸体解剖的在场者之一。那天，法医托马斯·诺古奇提取了梦露的口腔、阴道和肛门的黏膜，麦纳就在场。六年后，罗伯特·肯尼迪也死在这座城市里，给他做尸体解剖的，也是这位验尸官。人们曾经猜测是肯尼迪组织谋杀了梦露。给玛丽莲做完尸检后，法医们发现她的血液里含有一种叫做戊巴比妥钠的巴比妥类药物，浓度达4.5%，但却没有找到任何注射或者口腔摄入的痕迹。最后，尸检报告结论如下：可能为自杀。几年后，麦纳一直在体会这句话的用词，起初的几篇笔录他只写了：自杀或应为自杀。最后定为：可能为……也许从心理层面讲应该是这样——麦纳当时想。但这并未排除这位电影明星用了三十六年的时间才做成这件事，也不能排除她为此利用了一只罪恶的手。他当初在想能否用其他词来表达同样的意思：一个死亡游戏。或者像“自杀预防组”里的利特曼大夫所说的那样：一个致命的游戏。

倒片。早已退休的约翰·麦纳很想再次按下录音机的按钮，里面最好放入一盘玛丽莲·梦露录下的磁带，那是录给她的心理医生的，录音的时间为1962年7月末或8月初的头两天。拉尔夫·格林逊曾经在磁带上贴了一张标签：梦露的最后岁月。这些磁带麦纳四十三年前曾经听过，并且抄录过，但此后再也没见到过或重新听过。它们在这位心理医生生前（或是死后，谁知道呢？）就找不到了。现在能找到的只有麦纳当初作为法医时总结出来的那几句话。

老人手里颤颤巍巍地拿着一叠发黄发皱的纸，跟记者打招呼。贝克莱特请他坐下，并递上一杯冰水。

“为什么事隔多年您想到了找报社？”

“拉尔夫·格林逊是个好人。梦露死前很多年我就认识他。我在研究刑法学之前读的是医科，当时我就在加州大学听过他上的关于精神病学的课。我对他一直很尊敬，现在依然如此，他是个很有魅力的人。梦露死后两天，他曾要求我再次找他问话，因为他想反悔当初他对警察说的话。对于报纸上登的那些关于他的话，他感到很不安，报纸上说他是‘一个奇怪的心理医生’，是‘最后见到活着的梦露的人，也是第一个发现她死去的人’。他执意要我听两盘梦露死前一天（也就是1962年8月4日星期六）寄给他的磁带，还说要把磁带留给我，让我记下里面的内容，条件是我不能把内容泄漏出去，即便对检察官和验尸官也不能。尸体解剖后，有太多的问题我们找不出答案，难以提供证言。所以我觉得还是藏在心里比较好。”

“你跟他见过面？什么时候？”

“是8月8日星期三，他刚参加完梦露的葬礼以后，我们长谈了好几个小时。”

“怎么从来没听你谈起过这次会面？”

麦纳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道：“我记得他曾说过，有些事情不能说出来。即便流言四起，他也无法为自己辩白。想开口却又不能说确实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但他实在是无法将所有的事情透露出去。我也就一直保守着秘密，没有说出磁带的事。但是近来那些传记作家又开始攻击他当初对玛丽莲使用了暴力，甚至害死了她，我觉得我该站出来说话了。我已经见了一位名叫麦休·史密斯的英国记者，他后来就此写了一本书。还有，在我今天重新拿出当年的笔记来见你之前，我已经征得了拉尔夫·格林逊的遗孀希尔蒂的同意。”

福杰·贝克莱特提醒他说希尔蒂·格林逊曾对《洛杉矶时报》说过她从未听她丈夫讲过关于磁带的事。她对此一无所知。麦纳说，那是因为格林逊有着很强的职业操守，严格为病人保密。

“为了格林逊，我也一直保守着秘密。我今天之所以打破沉默，是因为他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另外，我答应过他的太太，必须反驳詹姆斯·霍尔、罗

伯特·斯拉泽、唐·沃尔夫、马文·博格曼之类的作家，所有这些人人都对梦露这位最后一任心理医生产生过怀疑。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唐纳德·斯伯特，曾经指责他‘身为心理医生，却罪恶地玩忽职守’。正是因为要替我所尊敬的格林逊回击那些玷污他名誉的人，今天我才想到要讲讲这些磁带的事。”

倒片。梦露死后整整四十三年，洛杉矶又一个闷热潮湿的夏日里，麦纳带着激动而略带迟疑的语气，在另外一台录音机前向这位记者述说1962年8月他去拜访格林逊的经过。

当麦纳走进格林逊面向太平洋的别墅时，这位心理医生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胡子也没好好刮过。麦纳坐下后，格林逊马上让他听了一段四十分钟的录音。录音机里，梦露在说话，录音带里只有梦露的声音，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声响，也没有谁在听或者谁在对话的痕迹，只有她自己，语气庄重而又私密，但并不脆弱。磁带中梦露的声音像从天堂传来，如同不可知的梦里的声音潜入听者的心田。

这肯定不是哪次治疗过程中录的音，麦纳补充道，因为格林逊从来不录病人的声音。是玛丽莲·梦露自己几个星期前买了台录音机，将治疗过程外的一段话录下来，递给了她的心理医生。

那天，麦纳几乎一字不漏地做了详细记录。当他离开格林逊的别墅的时候，已经觉得梦露不大像是自杀。

“在她说的那么多话中，有一点很肯定，那就是她有对将来的打算和对未来的期望。”

“那格林逊自己呢？他倾向于她是自杀还是他杀呢？”

“这一点无法说明。但是在我事后写给上级的报告中，我确信格林逊不相信他的病人是自杀。根据回忆，我的报告是这样写的：‘遵照您的要求，我和格林逊大夫谈了梦露的死因。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从格林逊告诉我的情况和他给我听的录音来看，我认为可以肯定这不是一起自杀事件。’我把报告寄出去后，一直没有得到回音。十天以后，也就是8月17日，法院宣布结案了。我的报告现在也已经找不到了。”

倒片。在喝了第二杯冰水后，麦纳继续讲他的故事：

“还有个问题，那天格林逊大夫没有明确回答我：如果他确信她不是自杀，那他为什么一开始称她是自杀？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我花了很多年才醒悟过来：那是因为他讲‘自杀’是在电话里、在死者的房间里，他很清楚每个房间里都布满了窃听器。”

“格林逊也许不是杀人犯或者同谋犯，”贝克莱特说，“但会不会是他帮助别人将一起谋杀掩盖成了自杀呢？”

麦纳默不作声。

“如果她不是自杀的话，那又是谁杀的呢？”记者接着问道。

“我想的不是这个问题。我想的问题并不是谁，我倒是在自问，是什么杀死了梦露？是电影？是精神上的疾病？是心理分析？还是钱，或者政治？”

说完，麦纳起身告辞，把两个又皱又黄的信封留在了贝克莱特的桌上。

“我无法给你留下任何证据性的东西。她的话我听见了，她的声音，怎么说呢，我已经不记得了。任何线索都是为了抹去原来的东西或掩盖别的线索用的。但我可以给你留下一样东西，虽然它什么都证明不了。这是一些照片。”

贝克莱特等老人离开以后才打开信封。他将为第二天出版的报纸写一篇文章，详述他如何得到关于磁带的文字稿。第一个信封里只有一张照片，是在一间停尸房里拍的，外边裹着层层白布，里面是一个裸体的、有标记的金发女子，面孔很难辨认。第二个信封里放着几张梦露去世几天前在加利—内华达酒店拍的照片，那是一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交界处的豪华饭店。画面上，一个男人看着摄像机镜头笑着，他骑在趴在地上的玛丽莲·梦露的身上，梦露则稍稍撩起遮住她左脸的头发的。

倒片。驼背老人麦纳走下了《洛杉矶时报》社的楼梯，但他没有找到出口，而在散发着陈旧油墨味的地下室里迷了路。在梦露去世四十四年，而洛杉矶郡检察院不顾对事实和档案的重新审查，维持当年调查结果二十三年后的今天，麦纳不希望把对梦露的纪念只留给那些每天从世界各地来到韦斯特伍德村墓园梦露的地下墓穴前静默的影迷们了。他一直不相信梦露是自杀，但也从未说过不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越来越觉得失望与痛苦。他想在他的有生之年弥补

一样东西，这样东西就是那两盒磁带留给他的形象，一个充满活力、幽默和期望的女子形象，而不是一个消沉的、想早日结束生命的形象。麦纳也知道，有一些人片刻前还对生活心存期待，过了一会儿却成功地断了自已；也有一些人不想活了但也不想死去。有时候，想死只是想结束生命中的痛苦，并非想结束生命本身。但他还是觉得梦露的表现是前后矛盾的，两盒磁带中的内容让他觉得她只可能是被谋害的。

但他最挂念的并非这一点。关于谋杀的各种假设使他相信，即便明知这是起谋杀，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肯定谁是作案人、作案动机又是什么。他想予以澄清的是谋杀当晚格林逊所扮演的角色。多年来他一直被这个问题折磨着，总是回想起这位沉默不语的心理医生、那个闪烁着紫色霓虹的夜晚、位于圣莫尼卡医生家别墅的泳池，和那张惊恐万分的脸。那晚，他问格林逊：

“对不起，我想知道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只是个病人吗？你对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她已经成了我的孩子、我的痛苦、我的姐妹、我的疯狂。”他自言自语道，好像在背诵一段引文。

倒片。麦纳这次来见福杰·贝克莱特并不是想告诉他这个阴谋的谜底，这个问题留给大卫·林奇的系列片《谁杀了玛丽莲·梦露》中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去思考吧。麦纳的来意是想让一个问题画上句号，那就是：“那三十个月以来，格林逊和梦露俩人在超出了心理分析界限的疯狂情感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 洛杉矶，西日落大道

1960年1月

许多年过去了，格林逊医生还清晰地记得玛丽莲·梦露第一次把他叫到病床前的那一天。“一开始，我们只是互相对视，像两只来自不同种群、互不理睬的动物那样，似乎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她太耀眼了，让我相形见绌。一位漂亮的金发美女和一个长相微黑的医生，真是不大般配……现在看来，我发觉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当初我是一个全身心投入的演员，利用精神分析来满足自己想要博取他人好感的需求，而她则像一个试图自我保护的知识分子。”

玛丽莲跟这位即将成为她生命中最后一位心理医生说，她就要开拍由乔治·丘克^①执导的影片《让我们相爱》了，她在影片中的搭档和情人是法国演员伊维斯·蒙坦德^②。几乎每次拍片她都会出现情绪障碍，现在遇到的心理困境仅仅是在好莱坞艰难工作中遇到的一小个。为了摆脱时常在摄影棚里把她击倒的心理紊乱、抑郁和焦虑，请心理医生成了她控制病情的必要方法。五年前她在纽约开始接触心理分析，先后接受过两位心理医生的治疗，她们

① 乔治·丘克 (George Cukor)，好莱坞著名导演。作品：《小妇人》、《费城故事》、《煤气灯下》、《窈窕淑女》等。曾是《乱世佳人》最初的导演。同性恋者。

② 伊维斯·蒙坦德 (Yves Montand)，犹太裔法国人，当时无名，后成为法国最富魅力的著名电影演员和歌唱家。

是玛格丽特·霍南伯格和玛丽安娜·克里斯。1956年秋天，在劳伦斯·奥利弗执导的影片《游龙戏凤》的拍摄过程中，她甚至请来了弗洛伊德的亲生女儿安娜替她看病。

1960年初，当她重返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时，这位老东家给她的片酬仍然很低，而且一如既往地怠慢她，她的绝望症状又发作了。由于事先签过合同，她还得以为他们拍摄最后一部影片《愿嫁金龟婿》^①。但是，拍摄工作无法顺利进展，玛丽莲无法很好地在影片中扮演那个叫做阿曼达·德尔的人物。剧中的德尔是一名舞女兼歌手，她爱上了一位百万富翁，但她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也不稀罕对方的金钱和名声。梦露常常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而神志不清，整个剧组不得不等她清醒过来。为了赶进度，这种时候通常是她的替身依芙琳·莫里亚蒂替她出境，她则坐在摄影棚里，等人调节摄像机、试镜，并等其他演员练习台词。刚开拍时，蒙坦德向玛丽莲流露过他自己的担心，因为他怕演不好，共同的担忧拉近了他俩的距离。剧本重写和拍摄过程中的反反复复使影片停滞不前，再加上导演的不专心，几近瘫痪的摄影棚内弥漫着灾难的气氛。尽管玛丽莲不是导致影片脱档的唯一之人，但是制片方仍然敦促她赶快行动，不要影响影片的拍摄。

玛丽莲在洛杉矶没有专门的心理医生，于是她叫来了玛丽安娜·克里斯，她在纽约已经为她治疗了三年。克里斯此时想起了拉尔夫·格林逊，一位在好莱坞很被看好的精神疗法医生。克里斯问他是否愿意接受一个难以对付的病例，并告诉他：“这是一个处于极度慌乱中的女人，一个大量吸毒和服药而可能自毁的女人。她正处于间歇性的焦虑症中，很脆弱。”最后，格林逊同意担任玛丽莲·梦露的第四任心理医生。

第一次治疗是在贝弗利山卡顿酒店，出于保密原因和对玛丽莲身体状况的考虑，谈话在梦露的房间里进行。第一次接触很简短，问了几个更涉及病人的身体状况而非精神状况的问题后，格林逊建议梦露今后到他的诊所去，因为诊

①《愿嫁金龟婿》是玛丽莲·梦露1953年拍的，下面的剧情介绍应该是1960年拍的影片《让我们相爱》的内容，并非《愿嫁金龟婿》的。

所离好莱坞并不远。在后来几乎长达半年的拍摄过程中，玛丽莲每天下午都要离开摄影棚去贝弗利山的罗克斯伯里北道见她的心理医生，那儿正好位于毕科大道的福克斯公司和日落酒店之间。

贝弗利山卡顿酒店的建筑像它的住客一样外表光鲜，外立面是粉红色的，讨人喜欢而又显得有些虚假，内部则是破破烂烂的、新某某主义的、失衡的结构。刺眼的颜色令人想起那些上了颜色的黑白影片。玛丽莲和她的丈夫阿瑟·米勒住在第 21 号房间，房里有个游廊，贴着青苹果色的墙布，伊维斯·蒙坦德和他的妻子西蒙·西涅莱^①则住在第 20 号房间。福克斯公司替这些住在类似于战前地中海复兴式风格的房间的演员埋单。

玛丽莲觉得“复兴”一词很可笑，没有什么东西会在某天“复活”，就像人们不可能重建昔日从未存在过的东西。不过，她经常叫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染发师从圣迭戈坐飞机过来，因为三年前，在米高梅公司的摄影棚里，就是这个染发师染淡了她在“疯狂年代”时期的头发。老太太除了会使用过氧化氢染发，其实更想顺便听听这位性感明星的奇闻轶事，比如她狂热的人生，以及孤寂的死。也许她的那些故事、她那淡淡的金发和那位染发师一样并不真实，但这时候玛丽莲就像在电影里一样，通过记忆的银幕看到了自己。

① 西蒙·西涅莱 (Simone Signoret)，演员，法裔，因英国影片《金屋泪》获第 32 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其他作品：《金盔》、《如此人生》等。

►► 好莱坞，日落大道

1960年

“天使之城”洛杉矶是个梦工厂，罗密欧·格林斯普（现名拉尔夫·格林逊）和诺玛·琼·培克（艺名玛丽莲·梦露），正适合在这里的好莱坞会面。这里充斥着聚光灯、闪光片和花环，演员们在炫目的镁光灯下展露他们忽明忽暗的灵魂。两个经历截然不同的人，只能是在这么一个戏剧性的地方相识相遇。

正是在这里，心理分析和电影遭遇了它们致命的联系。他俩的相遇是两个局外人之间的相遇，不是为了发现与对方的契合点或者相似的脉动，而完全是偶然碰到了一起。有些心理分析师试图对电影进行剖析——有时候甚至能够成功。与之相应的，那些从事电影艺术的人们思忖着如何把解析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医生搬上银幕。他们有钱、脆弱、神经衰弱、有不安全感，一个接一个地病倒，并用高剂量的“谈话疗法”来治疗自己。希区柯克的电影《爱德华大夫》的编剧，也就是十年以后被玛丽莲请来捉刀写回忆录的本·赫特，在1944年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我恨演员》。他在书中描述了当红影星患的各式各样的精神病症：偏执狂、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紊乱。“好莱坞里所有人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精神抑郁症哪一天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我认识的一些制片人，即便十年间从未有过这种担心，有一天也会像操劳过度的天才那样突然垮掉。大概在演员身上，抑郁的比例是最高的。”

格林逊和梦露相遇的1960年初，好莱坞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1926年玛丽莲出生的时候，好莱坞正值鼎盛时期，现如今，那些曾经辉煌一时的电影制

片厂门可罗雀，只有从旅游大巴上下来的各地游客还会去参观那些已不知去向的昔日大腕们的幽灵所在地。今天的日落大道上，也只有那些讲西班牙语的妓女四处游荡，身后是被砸坏了玻璃门的韩国食品店。如今，有些想调节一下自身感官灵敏度的人偶尔会想到心理分析，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心理分析和电影结合的那个年代了，那是思想和诡计的联姻，也是金钱与金钱的结合，又往往是荣誉之间的联盟，有时也会有血的联系。那是视觉艺术家和动嘴皮子的人同甘共苦结成的联盟。那时候，心理分析不但治好了好莱坞人的心灵，而且也打造了赛璐珞梦想之城。

罗密欧和玛丽莲的相遇是心理分析和电影的又一次相遇：彼此都分享了对方的疯狂。正如所有美好的相逢和持久的结盟一样，这次相遇建立在一个错误之上：心理分析师聆听的是看不见的念头；而从事电影艺术的则将无法言说的东西搬上银幕。电影将心理分析置于其自身之外，这个历史持续了二十年，它和好莱坞一起终结，但幽灵犹存；而电影也正如被分析师分析的病人一样，长久地承受了再现其记忆的痛苦。

►► 洛杉矶，麦迪逊大街

1988年9月

在洛杉矶著名的 Chiat-Day 广告公司的节日大厅的门楣上，几个霓虹大字闪烁着一句标语：很多专业人员都是疯子。大厅的拱顶用具有异国情调的木头和漆过的钢材装饰成酒窖的风格并吸满了氢气球，墙上则糊着用皱纸做的阳伞，桌上都是些迪斯尼风格的抓人眼球的小玩意儿。组织这次盛会的都是些名

Marilyn Monroe | 11